

王筠《说文句读补正》批注手稿拾遗

吴有祥

王筠(1784-1854),字贯山,一字伯坚,号蓁友,山东安丘人。道光元年举人,曾任国史馆誊录、山西乡宁县知县等职,咸丰四年十二月卒于乡宁县署。王筠毕生致力于《说文》研究,与段玉裁、桂馥、朱骏声并称为清代“《说文》四大家”。他生前的藏书,历经一百多年的兵灾战乱及政治运动,至今仍有一部分较完好地保存在其七世孙王琳先生手中。2004年11月,王琳先生将家藏的近百种古籍约2000卷捐献给潍坊学院图书馆,成为我校图书馆的珍藏。这批古籍包括王筠著作的刊本如《说文释例》、《说文句读》、《文字蒙求》、《毛诗重言双声叠韵说》等,还有一些他生前批阅过的书籍如《重刊补注洗冤录》、《六书通》、《方言疏证》、《筠廊偶笔》等,书内钤有阴文“王筠之印”和阳文“蓁友”两方藏书印章,间有他批注的手迹。这里介绍一部《说文句读》的残本,是王筠晚年为《说文句读》作补正的批注稿本,版本价值弥足珍贵。

《说文句读》是王筠研治《说文》的代表作,也是王氏“说文四种”中较晚刊刻的一部著作,该书初刻于咸丰二年(1852)曲沃知县任上。据郑时《王蓁友年谱》^①载,当时王筠已年近古稀,由于为官清廉,他本人无力刊刻此书。“曲沃荐绅张子特、崔绍闻、张鹤书、王恩耀、苏廷绅辈,皆慕先生之学,怱怱邑人争助以资,俟毕工,以书偿之。”书成之后,王筠已染沉痾,身体很虚弱,遂于咸丰四年七月“以病乞休”。但就在这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,他仍每日检视群书,孜孜不倦地对《句读》进行删订增补,本书就是他去世前批注在《说文句读》初刻本上的《补正》文字^②。

①上世纪30年代,屈万里、郑时两位先生锐意搜求王筠的遗文佚稿,辑成《清诒堂文集》一书,由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。书末附郑时先生所撰的《王蓁友年谱》和《王蓁友先生著述考》两文。

②按,国家图书馆收藏有《说文句读》稿本十五卷(6册),中间缺卷六至卷十一,为刊刻前的清抄本,书页空白处密布王筠手书的批校文字。第十二卷末尾有一行题识:“己酉二月十六日校改一过,三月十八日又校一过。”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(1849)。此稿本为梁启超生前所藏,卷首有“饮冰室藏”的朱文印章,卷尾有梁氏的一段题识。其年代早于潍坊学院图书馆的批注稿本约六年。

该书一函四册,存卷一、卷二、卷十一、卷十二、卷十三,共五卷。板框高 20 厘米,宽 31 厘米,四周双边,白口,单鱼尾。书内密布朱笔圈点,行间空白处及书页的天头、地脚有王筠手书的批注文字,字体多为行楷书,遇有文字多时,则书签条粘于天头,或另书一纸夹于书页中间。每卷末尾注明批校的日期。如卷二末:“甲寅四月十七日校改一过。”卷十一末:“六月四日校一过。”卷十二末:“六月初六日校一过。”卷十三末:“六月初九日校一过。”甲寅为咸丰四年,即王筠去世的当年。书前的序言作于道光庚戌(1850 年)四月,序后有一段王筠手书的题识墨迹:“咸丰四年八月覆阅之,至十月杪而毕。凡所删改增益约数百事,将别勒为一册,刻为《补正》。十一月初三日冬至记。”旁边钤有“王筠之印”、“葦友”两方印章。案,《补正》直到咸丰九年(1859)才由其子王彦侗刻成,分附于《说文句读》每卷的卷末,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由礼部进呈御览,即同治王彦侗刻本,亦称“御览本”。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所影印的就是同治刻本。前有潘祖荫序、王筠自序,附上述题识文字,后有王彦侗的手书题跋:“是时先大人已病,犹日钞别册不释,至第六卷遂成绝笔。十二月初九日疾革,彦侗以是册宜付梓为请,然之,遂卒。痛哉!用是敬遵遗命,与孙玉山先生蓝田校而梓之。九年七月男彦侗谨识。”王筠卒于咸丰四年十二月九日,序言后王筠的这段题识作于他去世前的一个月零六天,当是其生前绝笔。

笔者将王筠手书批注的补正文字与王彦侗刻本的《补正》作了对校,发现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,《补正》基本上照录手稿原文,但有两处稿本的补正文字,刻本《补正》未收。现将这两处文字抄录如下。

《句读》卷一“示”部“祲”字条,《句读》原文为:

祲,祥也。今《尔雅·释言》“祺,祥也”,以与“祺,吉也”连文而讹也。

稿本该页的天头粘有一签条,上书:

近有人不知“祺,祥也”之为讹字,反欲改《周颂》作“维周之祺”,我故于此辨正之,阅者勿视为闲话。(刻本《补正》漏收)

《句读》卷十一“东”部“……”字条,《句读》原文为:

……,二东也。……从此阙。《系传》曰,《说文》旧本无音,今字书音……,筠说已详《释例》。

稿本该页的天头也粘有一签条,上书:

《字典》曰,《说文》“一周天也”,今作遭贅。案,先引《字汇补》,而后引《说文》,或即《字汇补》所引耶?今各本及诸书引《说文》者并同,未有引此者,惟《字汇补》……音遭,与《集韵》同耳。姑记再考。(刻本《补正》漏收)

笔者推测王彦侗刻《补正》未收第一条批校文字的原因,可能是为了避免触犯阮元。因为阮元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毛诗正义》卷十九《周颂·维清》诗的后半部为:“肇禋,迄用有成,维周之禋。”阮元在《校勘记》中考辨“禋”字道:

小字本、相台本同。唐石经初刻“禎”，后改“禎”。案，《释文》云：“祺音其，祥也。”《尔雅》同。徐云本又作禎，音贞，与崔本同。《正义》云：“定本《集注》，祺字作禎。”考此《传》云：祺，祥也。《笺》云：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。皆用《尔雅》“祺，祥”、“祺，吉”之文。《释文》《正义》二本皆作祺，是也。其作“禎”字者，非也。《诗经小学》云，恐是改易取韵。亦见《经义杂记》。唐石经初刻又误作“禎”，乃涉《大雅》耳^①。

阮元的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以校勘精审、考据严密而著称，被公认为清代校勘学的集大成之作，嘉庆二十一年他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行世后，其校勘成果通常被学界视作定论。但王筠不赞同阮元认为“维周之禎”为“维周之祺”之误的观点，坚持认为今本《尔雅》的“祺，祥也”为传写讹误，说见其《说文句读》卷一。许慎原文为：“禎，祥也。”“祺，吉也。”与《尔雅·释言》的“祺，祥也。”“祺，吉也”释义不同。王筠认为：

今《尔雅·释言》“祺，祥也”，以与“祺，吉也”连文而讹也。《周颂·维清》《传》：“禎，祥也。”《正义》以为《释言》文。引舍人曰：“禎，福之祥。”

王筠认为“祺”字的本义与“吉”相通，而无“祥”义，《尔雅·释言》的“祺，祥也”乃是讹文。他在签条上所指的“近有人不知‘祺，祥也’之为讹字”，显然是针对阮元的校勘而言，这在当时为一大胆的举动。因为阮元重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在道光、咸丰年间早已颁行天下，获得了学林的交口称誉，具备了某种程度的“钦定”官学性质，一般学者不敢对其校勘成果提出质疑；而王筠则明确指出阮元的校勘错误，表现出实事求是、不迷信权威的学术立场，但也冒着触犯时忌的风险。王彦侗于咸丰九年刊刻《补正》时，虽然阮元已去世十年（阮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），但其门生故吏还多健在，许多人在朝廷身居显职，而王彦侗又想将此书进呈“御览”，因此他不能不有所顾忌，只能忍痛割爱，将父亲签条上的补正文字删去。这一事实说明了清代政治对学术的影响，即使是纯学术的考据学，也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势力的潜在干预。

至于王彦侗不收第二条手稿文字的原因，笔者推测是出于学术的考虑。因为对于“曹”字的读音，《说文》与其他字书、韵书的音注有异，王筠在《说文释例》卷八“叠文同异”中对此已有详细的考辨^②，待他晚年批校《句读》时，又从《集韵》《字汇补》等书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，与他此前的结论不同，但一时又难以定夺，因此他“姑记再考”，表现了实事求是的阙疑态度。王彦侗对于父亲这个尚无定论的学术疑点，自然也无所适从，于是便干脆删去，以免枝蔓。

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琳先生的协助，谨致谢忱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潍坊学院中文系

①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。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阮元刻本，第587页。

②详见《说文释例》卷八，武汉市古籍书店，1983年影印本，第353-354页。